

《乡村造梦记》序

□温铁军

我第一次来宁德做农村调研是在28年前的1993年,宁德地区通过福建省政府向国务院申报国家级“农村改革试验区”,而我当时是“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分管立项工作的调研处处长。那次,我到过包括屏南在内的宁德地区的每一个县,领略了这里美丽的绿水青山和丰富的

人文资源。后来多次来过宁德,特别是2013年我为福建省百人计划引进人才到福建农林大学工作以后。

我和屏南的不解之缘起于2020年8月福建农林大学与宁德市农业农村局的横向课题,我带队来屏南调研,到2020年11月成立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大家要我担任院长。那以后就多次来屏南,主要是去研究院所在的四坪村。每次来都是为了向以周芳芬(原屏南县政协主席)为代表的基层干部、新老村民等“乡村造梦者”学习。

现在我们在乡村振兴战略贯彻中面临以下共同的问题——怎么理解产业兴旺与审美、文

创、展览的相关性?乡村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乡土

教育的重建有没有经济效益?怎样才能让这些为

文付出巨大努力的各级干部们在上级面前能够

说得出让他们觉得被主流认可、算是比较积极

的话语?怎样才能形成我们跟主流的一个对话?

否则如果光说一些“精神崇高”的话,对上级而

言,在主流评价体系中没有加分,那当然也就没

有获取资源的能力。当前,更重要的还是要让我

们服务的乡土社会有复兴、有发展的空间。

万物求诸“野”

我可以用的十九大修改的党章中关于主要矛盾的归纳来支撑我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解释。但现在我要写的是这部书写屏南乡村振兴乡村的长篇报告文学《乡村造梦记》的序言,那就不妨借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屏南经验。

人们应该担心自问,什么是最高层次的需求?答案是审美。为了达到审美的需求,人们可以付出巨大代价,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要达到审美这个最高层次的需求,人类就得超越一般意义的物质享受而去追求精神升华。而在当代人类追求精神升华的多种方式中,回归自然、在与大自然直接结合过程中形成生态审美,则是审美所对应的精神世界中最具分享性的领域。

不妨再看屏南的审美实践。那里的艺术家们在屏南实践中要告诉我们什么?其实是人们可以不用工业化时代结构主义的美学方法,而是用后现代抽象派的超现实主义的美学方法来表达,意思是任何人都可以表达。后现代激进的艺术流

人类文明究竟是怎样起源与诞生的?起源于何处?又向何方迁延与拓展?人类文明的诞生缘于何因?它与什么因素息息相关?人类诞生之后,它究竟遵循的是什么样的迁徙与繁衍规律?人种究竟是如何进化的?世界上各个族群是怎样诞生的?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轨迹?这些族群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民族与种族、民族与族群、后生民族与原生民族、种群与国家政权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联?人类文明又是怎样衰败与消亡的呢?是战争、争夺还是自然灾害?抑或是其他外力的作用?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全世界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文化学者们。我也曾一度思考这些问题,但苦于没有清晰的答案,直到我读完内蒙古作家官布扎布的这部《人类笔记》。

当人类的第一粒种子在东非落地生根之后,它就开始了漫长而复杂的繁衍与迁徙之途,它越过白令海峡,向四面八方迁徙着,并形成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各种人种,这些人种,就像漫天的繁星,操着各种语言,具有各种文化特征,繁衍着各种文明。于是,也是有了关于人种起源与变迁的各种各样的学术探讨。官布扎布的这部《人类笔记》,便是关于人种起源、人类变迁、文明繁衍与迁徙、族群演变的一部大书,这是一部人类文明变迁的大历史,是一部人种变迁的大历史,也是一部人类族群演变的大历史。这部大历史,不单是纵向的时间演变,也是横向的空间演变,它让我们的视线在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中不断迁徙、转换,从东非大裂谷,到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到古埃及,到地中海,到爱琴海—西奈半岛,到古印度山脉,到帕米尔高原,到黄河流域,从上古神话到中古宗教神学,从印欧人种到东亚黄色人种,从古印度数字符号的创造到小亚细亚赫梯帝国冶炼技术的发明,从苏美尔的天神崇拜到古印度的种姓制度,从古巴比伦的天文学到古希腊的哲学,从日耳曼人到罗马人到哥特人再到匈奴人,从东胡到鲜卑到北魏政权再到吐谷浑政权,从慕容鲜卑到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的鲜卑山到内蒙古大青山到陕西渭水流域再到青海的湟水流域,从北匈奴故地到内蒙古河套地区再到大青山,从平城(大同)到洛阳,官布扎布的笔触所及之处,即是人类文明版图的扩张之处,官布扎布在时间的纵坐标与地域的横坐标上,勾画了人类文明变迁的历史版图,此种手法,非大历史而为何!

官布扎布并非人类学家,亦非专门的历史学家,也非专门的考古学家,他是一个作家,而且是翻译过《蒙古秘史》、撰写过《蒙古密码》具有鲜明蒙古特色的蒙古族作家,但他兼具人类学家的睿智、历史学家的纵深、考古学家的严谨,同时又具有作家的情怀,他的文字既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他怀着对人类文明先知的敬畏,饱含深情地礼赞人类文明,他的文字节奏舒缓,一如蒙古长



派,也是艺术领域现代性批判中最为激进的表达方式,强调从技法的写实主义阶段进入到后现代阶段,于是有了对林正碌在屏南开展“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歌唱家”的新解读。

林正碌先生说,当年音乐老师说他五音不全,很多普通人应该有的音乐享受就是被儿时的这种定性毁弃了……但对林正碌这样的“奇人”来说,这完全无碍于他现在自己作曲,自己写词,再唱出自己的歌!诚然,尽管如果用工业化时代非常严格的音律要求,他也许仍然有五音不全的问题,但在他这种后现代艺术家那里都不重要了。因为在后现代的阶段,像一间工厂那样完整精准地表达音律的格式化歌曲已经不重要了,比如摇滚就与画家里野兽派的表达相似,它并不要求你必须精准达到那个音高,后现代音乐也早就不是乐谱规范、想要表达半音都必须清晰的工业文明阶段的音乐。

这些超过现代制式教育、超过学院派规范的东西,其实是人的一种本性的激发,所表达的是万物返野,“野”就是今天的大自然,就是今天的生态化。中国正在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迈进,我们可以不再按照工业化时代时必须标准的、非得结构化不可的制式教育和技术规范来做艺术领域的创造,因为结构主义体现的是工业化时代的需求,而万法求诸野体现的是生态化。可见,在生态化新时代,人完全放弃了那些拘束,追求所谓求诸于野的这种审美,对于所有的这些被称为新村民的外来人,都有一种推进自主创业的影响,这恰是产业兴旺最为需要的。

乡村是实现生态化最广阔的地域,因为互联网时代到来,生态资源丰富的乡村和工业化的城市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原来只能在城市里发展的文创产业,现在移到乡村也一样能够实现,使得万物求诸野有了实际可推行的路径。屏

南的文创振兴乡村抓住了这个时代机遇。

当你进入到龙潭沿溪居住的这些人中间的时候,就像新村民曾伟所说:其他各地搬来村里居住的新村民们经常在他这儿举办社交活动,交往的频率远高于城市。由此,他就感觉到那种逃脱了城市钢筋水泥森林,从而回归于“野”的感觉。新村民们回归大自然才有“万物求诸野”的那个感受,当然是需要增加相互之间交流的。

在那种资本高于一切的城市社会环境下,人们也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去交流、去发泄。所以早期进入资本主义文明的这些发达国家,当没有地方容纳人际交往的时候,就只能去酒吧。由此,西方很多文艺作品表现的就是酒吧交流。里边当然就有各种各样能让你感受到的“有人的感觉”“有人的表达”。但是在中国,好像大部分城市人群不去酒吧,于是乎大妈大爷们就跳广场舞,去茶馆摆龙门阵、打麻将,以及各种各样的那种需要聚会的“人的追求”。

作为人,就要交往,这是一种本性的追求,但在城市里边其实很受压抑,因为白天晚上都是看不见天的,即使仰起头,看的也都是那些几十层上百层的高楼大厦,这些巨大建筑群代表了一种驾驭一切资本的力量,压制着所有人的基本需求。

我在这里只是说,当人们的这些为人的需求表达都在山野之中得到释放的时候,所释放出来的被社会所需求的感觉,其实是有着无穷创造力的!

文创赋值促进城乡融合

大多数人知道“精神变物质”,却只有很少人知道怎么变。这些知道怎么变的少数人,就是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所描写刻画的人才。

我们要让这些精神、文化与社会演变而成的物质增量,即把原来只按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成本来算账的那些产品,变成一个人人可以自由表达精神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这本身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增加值。如果从龙潭村、四坪村的发展经验看,我认为文创赋予了产品甚至不止十倍的增加值,对乡村振兴而言,它的开发潜力是巨大的。

现在因疫情或因全球化挑战、因美国强割去中国化,乡镇中有一大批返乡者,有的是在外边创业或打工失败了回来的,很多是小老板,兜里揣着几万块钱,如果无业可就,很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乡村现代化治理怎么治理?这就是挑战。

很多返乡创业者,因为在城里打工失败,或者在城里经营失败,没法在城里继续待下去了。城市每一天的开支都是巨大的,而回村里的开支

低,过得下去。

乡村开支低在什么地方?比如一栋老房子的修复成本,大约每平方米800—1000元,超过这个数成本就失控。熙岭乡用“工料法”,基本上把一座老房子的物业修复成本维持在平均每平方米800—1000元,意味着这些在城市失败的经营者的回村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开业经营。先不论工料法的收益如何,总之它能使得乡村古宅的修复成本降低,也就是经营者们进入的门槛低了,进而促进了新业态发生。比如原来在城里开饭馆、在城里办文创经营,失败了,于是带了点活钱回来,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进入乡村正在活跃起来的新业态?怎样形成可持续的条件?首先,就是门槛得低,进来了才相对有收益。如果进入门槛高了,比如乡村建筑的一切项目都按照第三方设计、评估,有资质的建筑公司来施工,那就极大地提高了休闲旅游和民宿的进入成本,也无法吸纳这些返乡的“城市失败者”。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倡“城乡融合”。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怎么融合是关键。

首先是这些人能回来并且能安顿下来。须知,龙潭村原来只剩下不到二百人,而且大部分是老弱病残。可现在林老师搞“画家村”带动文创产业发展起来,回村的老村民人口至少增加了三百多人,再加上各地来的新村民一百多人,短短三年便涨到三倍的村内人口,这其实就等于贯彻了中央要求的“六保六稳”,替国家承担了很大的危机代价。中央强调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是乡村振兴,屏南县的乡村振兴经验,就是中国靠乡村振兴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有益探索。

当然,到现在为止,有很多人还不善于把发展这种文化当作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也不重视发展审美的、激发人的创造力的、激发乡村活力的这些价值发现。

不过,我们不必急于去争论,而是应当与大家共同讨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新”的讲话,要求各部门将维护旧阶段的旧理念当作深化改革对象,通过改革转化成对生态文明新发展战略的新生产力要素的开发。只有深化生态文明所需的改革,才能把生态要素的解放和人回归大自然的解放纳入新阶段,在打造新格局的过程中推动有机整合。

从屏南的经验看,其实我们山区有着相当大的空间生态资源还没有被开发和利用,当然,现在有些空间资源被艺术家们用于做艺术表达了,比如艺术家在村里面做的画展,比如搞竹文化的创意,等等,这是艺术家在他的视野中的一种表

探寻人类文明密码的大历史

——评特·官布扎布的《人类笔记》 □朱中原

调般婉转与悠扬,读他的文字,你的思想的野马,会随着旋律的行进,奔腾在广袤无垠的欧亚大草原上。读他的文字是轻松的、激荡的,他没有历史研究者那样的繁琐考据,没有考古学论文的枯燥与乏味,没有文献学著作那样的掉书袋,也没有当下学院派学术著作那样的中西八股,他将纵深的历史与复杂的脉络,用历史散文般的轻松笔调徐徐展开。但他的文字又是深邃的,严谨的,理性的,而不是当下时髦的小散文,不是伤春悲秋,不是吟风弄月,不是花前月下,不是吃喝拉撒、油盐柴米,他抛开了所有当下散文的风格,独辟蹊径,选择了将历史随笔化、散文化、文化化,他的表现手法,在叙事与论述、描写与刻画、抒情与议论、纪实与想象、虚构与非虚构中展开。尽管他的主线是纵式的,基本沿着人类大历史的脉络行进,但又在时间的纵轴中插入横向的叙事,时常旁逸斜出,就好像一条缓缓流淌的弯曲的河流,突然遇到高山峡谷,而变得陡然湍急凶险。他时常在各章节中采用倒叙或插叙的表现手法,将人的视线由现实拉回历史,又从历史拉回现实运用电影的镜头语言,用闪回的叙事手法,使作品显得摇曳多姿,生动有趣。就体裁而言,他的作品不是历史小说,也不是专业的历史著作,而是具有鲜明的历史散文风格,可称之为历史大散文,为叙述需要,我姑且杜撰了一个概念,叫历史文学作品。在他的历史文学作品中,虽然研究的是严肃的人类历史,但他采用了诸多文学表达手法,除了前面提到的之外,还掺入了大量的想象、比喻与夸张等文学手法。

作家写史与史家写史有很大不同,各有优劣,甚至互相齟齬。史家写史,优势在于史料翔实,叙事客观、严谨,不掺杂任何虚构与想象的成分,甚至不掺杂任何文学手法,这固然客观,但却流于呆板、枯燥、乏味。而且,谁能说历史就一定完全是客观的呢?任何历史,都是由叙事者叙述出来的历史,也即由人来完成,既然是人,就使得任何历史叙事都具备一定的人的主观性,也即人的主观性构成了史观。而且,不同的人,如果站在不同的角度,所观察到的历史就可能完全不同。所以,在我看来,无论是作家写史还是史家写史,都离不开史观,甚至史观是历史写作中最不可或缺之构成。所以,在此,我要为作家写史多呼吁几声。作家写史,固然未必有专业史家之严谨性与客观性,但作家写史却打破了史学文体的单一化与模式化,使得历史

叙事多元化、多样化、生动化、形象化,当然也文学化。但也正因如此,作家写史也免不了存在诸多局限,即主观性、随意性太过,而客观性、严谨性不足。我读过很多作家写史,尤其是作家的民国史写作,尽管叙事手法颇为生动,但总不免歪曲历史太过,自我臆想或主观臆断成分太过,这样的作品,只可当文学作品读,不可当严肃的历史作品读,仅仅只能作消遣而已。然而,官布扎布的《人类笔记》,打破了我对作家写史的一贯认知。官布扎布并非只站在作家的立场,也非站在狭隘单一的蒙古族立场,而是站在人类历史的大视野下,用宏观、理性、睿智、多元的眼光去审视人类文明的变迁。而且他并没有自主张地对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变迁进行自我解读,而是遵循了人类学界的一般研究,比如,他认为人类文明最早应该是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地区,而非古埃及,也就是说,苏美尔文明早于古埃及及文明,这是人类学界的最新权威研究成果,在没有新的史前考古证据公布之前,是不能轻易推翻的。官布扎布既没有随意地提出新说,也没有盲目地固守旧说,而是对人类学界的新说进行了哲学化的演绎和文学化的描述,我认为这是此书的一大成功之处。

贯穿此书的重要线索,固然是人类文明的时间与空间变迁,但维系人类文明繁衍的纽带是什么?过去人们提出了很多学说,但官布扎布却提出了一个自己的新说,他认为,人类文明的变迁,根本上是由于对生存资源的争夺与控制,这是所有人种与族群变迁的核心纽带。我认为这是此书的一大创见。

在这样的精神纽带支配下,作者从人类文明的诞生地苏美尔讲起,他说:“一拨又一拨的闪米特人拥向苏美尔,将以城邦形式存在的这个地方依次推入了阿拉德帝国形态、巴比伦帝国形态、亚述帝国形态,并将苏美尔这个生存资源核心产地扩展到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还将共同另一个生存资源核心产地的尼罗河三角洲连接到了在一起……于是,古希腊人从地中海里边,波斯人则从东边的东边,开着战舰或鞭打着战马向这个已经发展得丰腴的生存资源产地进击而来。”

这段话只有短短三百来字,但却清楚叙述了人类文明几个中心地区的相互连接与往来关系。西亚两河文明、尼罗河三角洲文明、爱琴海文明、地中海文明、中亚文明、南亚古印度文明、

东亚黄河文明等几种文明形态,并不是互相割裂的,而是互相连接、互相关联的,而这其中的关联,又以苏美尔为核心,围绕生存资源的争夺进行展开,这既是本书的关组,也是人类文明发展与变迁的关组。只有把这个关组解开了,人类文明的密码才能解开。的确,在横跨欧亚大陆的广袤草原上,曾经一度活跃着无数个人种、族群和国家形态,产生了无数个帝国和帝王,也诞生了无数的英雄故事,这片广袤的土地,将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的无数个文明形态相勾连,而要梳理清楚这片土地上复杂的种群、族群、国家、政权、宗教等的变迁,没有广博的学识是无法做到的,所以,这本书也因之而具备了人类学、人种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宗教学、军事学、地理学、国家学、文学等领域的广阔学问,这些多学科的学问,在作者笔下并不是支离破碎,或者各自为政的,而是互相有机地统合在一起。

以苏美尔为中心,我们可以看到这部书为我们勾画的种群更替与文明嬗变的宏阔历史版图。苏美尔作为人类文明生存资源的核心产地,吸引了无数族群的到来,并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与厮杀。首先是闪米特人进入苏美尔,建立了阿卡德帝国,但是两个世纪以后,生活在东面扎格罗斯山区的古梯人就以摧枯拉朽之力入主苏美尔;约20年之后,古梯人又被逐出了苏美尔,另一支居住在苏美尔的闪米特人进入巴比伦,建立起政权。到公元前2100年时,汉谟拉比王朝又在苏美尔地区建立,不仅占有了苏美尔,还把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统合到了自己的版图之内。当这支闪米特人成功进入苏美尔百余年之后,原住扎格罗斯山区的加喜特人又举族而来,推翻了汉谟拉比王朝,而建立了加喜特王朝。接着另一支闪米特人即亚述人来了,公元前1225年,亚述人推翻了巴比伦王朝,成了苏美尔的主人,建立了统治150多年、横跨叙利亚到地中海东岸即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地区的亚述帝国。然而,“当亚述人高傲而蛮横地主宰着苏美尔时,他们没想到,有人来猛烈地敲门了,来者就是迦勒底人,另一支闪米特人,他们在两部雅利安语族人的帮助下,推翻了亚述帝国的统治,成了苏美尔—美索不达米亚的新主人”。

苏美尔—美索不达米亚是如此,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古印度河流域、古黄河流域同样如此,在每个文明繁盛的生存资源核心产地,都聚集着无

现方式,但是也需要进一步拓展为多业态创新。例如,把轻钢结构的美术学院和大自然万物及其与人生百态的绘画表达形成有机结合。

屏南的发展,就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再进一步做好艺术深化,形成有包容性的“公益品牌”,从而带动人皆有之的审美层次的精神追求。

发挥人的作用

就像我们在工业化时代的审美追求也在行化之中一样,在那个阶段,大家被工业社会的大资本压抑到实在不行的时候,艺术界就把审美追求行化成了野兽派,音乐家追求摇滚、重金属,这些东西都是被工业产业资本压抑到极端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反抗而演变出来的艺术形式。

人类从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到生态化阶段,当审美和生态结合的时候,它应该是温暖的、和谐的。当工业化阶段人性偏重自我的那种表达,发展和行化到了一定程度,继而之起的是和大自然、生态多样性有了一种内在融合的艺术感觉。

这个新阶段到来的时候,人们的创意所形成的题材会是更为丰富的,由此带动原来传统的单一产业形成多业态演变,比如过去村里的种子产业,现在开始做升级加工。但怎么才能让它再进一步有创意、有题材,就是一个面对细分市场的非常丰富的文创发展空间,这种多业态下提质增效的发展方式正在被艺术家们开发出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人力的、人才的作用,恐怕也不能只局限在有形的艺术表达上。屏南当前初步形成的所谓艺术教育,包括学院的和民间的创新能力的结合,也是一个很大的、待开拓的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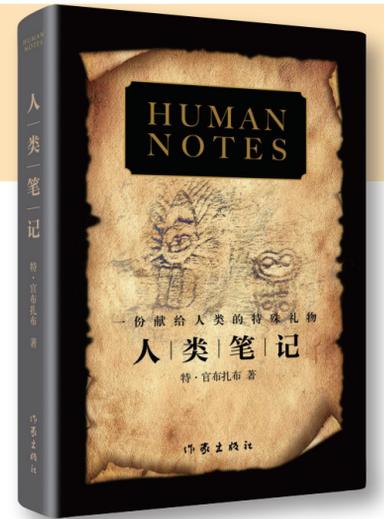
所以说人才怎么用,怎么才能用好、用活,怎么让他们为现在屏南的生态化的新发展阶段发挥引领作用,这恐怕仍是当地一些描绘乡村振兴蓝图的人未完成的任务。

说到这,应该回到序言正题上。来屏南这几

次调研和讲课交往了很多人,其中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本地一些领导干部的“爱故乡”情结,带有中国传统的乡贤对家乡的情感。是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创造出了很多屏南文创推动乡村振兴的经验。这次非常荣幸为作家沉洲的《乡村造梦记》一书写序。据说他用几个月的时间沉浸驻点采访,又打磨了近一年时间,书中全面描写了屏南文创振兴乡村的来龙去脉、酸甜苦辣,塑造出乡村造梦策动者林正碌和被他“七天公益艺术”教出来的一批农民、残疾人、逆城市化者以及那些县、乡、村干部的感人形象。这个故事创造出的正能量符合当地的创业环境,也正是屏南吸引着一群又一群“主流”“非主流”年轻人来此创造、见证、生活的原因。我们也融入了这群乡村造梦者,大家共同推进的故事还在继续着,期待更多城市群体,特别是趋向于绿色主义的中产阶层主动融入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去。

(摘自《乡村造梦记》,沉洲著,作家出版社

2021年12月出版)



数个族群和政权,他们为了争夺生存资源,不断战争,分分合合,生生死死,文明也在这些战争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变异、衰败、消亡,而一个文明消亡了,另一个文明又诞生了。消亡的文明往往是先进的文明,而先进的文明往往是被野蛮的族群所摧毁,野蛮的族群在摧毁先进文明的进程中,往往又融入了先进文明的元素,于是形成另一种文明,人类总是在如此反复中进化、繁衍、生息。我想,这就是本书的主旨。作者在书写这些历史时,几乎每一章的开头,都有几句类似诗歌的形式,像是在抒发,又像是在浩叹。

我很佩服作者对于文明史的勾连能力,能够把如此复杂多变、线索繁复的文明形态梳理得如此清楚。

在这部书中,作者几乎对整个世界上已经消失和尚未消失的族群与人种进行了长线考察与纵深勾勒,苏美尔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古埃及人、阿拉米人、多里安人、古罗马人、古希腊人、雅利安人、波斯人、马其顿人、日耳曼人、迦太基人、高卢人、阿拉伯人、斯基泰人、帕提亚人、闪米特人、腓尼基人、古康居人、古巴人、月氏人、匈奴人、鲜卑人、塞种人、突厥人,等等,抽丝剥茧,对这些族群与人种的变异、变迁与消亡条缕析,而且对这些人种中的一些文明发现予以梳理,并对以往存在的错误认知进行了纠正。比如阿拉伯数字,在作者看来,以往一贯认为阿拉伯数字是由阿拉伯人发明并由此带到欧洲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阿拉伯数字是由古印度人发明的。我认为这并不是